

美國新聞媒體對「六四天安門事件」報導 內容之分析

蔡瑋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前言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北平發生學生及民衆爭取民主的示威行動，天安門廣場成了羣衆聚集，交換意見，表達訴求的絕佳場所。示威羣衆「控制」了廣場達數十日之久，部份示威羣衆甚至在廣場上露宿、絕食，希望迫使中共當局對學生的示威要求有所回應。示威行動也使得五月中旬在北平召開的「中蘇高峰會議」受到干擾，被迫數度更換會議地點，使中共顏面大失。這次示威行動是自一九八七年底，一九八八年初學運失敗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行動，再加上中共的不當處理方式，用流血屠殺的殘酷手段鎮壓了這次民主運動，其影響極為深遠，國內外的新聞媒體曾經對此進行廣泛的分析和報導。

學運初期，一般對整個事件尚持相當樂觀的看法，認為以學生理性的訴求，節制的行動，中共可能以溫和的方式，對示威羣衆的要求有所回應，讓這次學運以和平的方式收場。^①但是事情最後演變的結果却是超出了絕大多數文明人類、國家，以及學者、專家的理性思維範圍之外。五月二十日北平地區進入局部戒嚴，愈來愈多的跡象顯示中共可能採取強硬措施，以打擊持續擴大中的民主運動。六月三日深夜，四日凌晨，中共出動軍隊以流血屠殺的方式，鎮壓了這次它所謂的「反革命叛亂」活動。天安門廣場上死難的學生和羣衆數目迄今仍然無法正確估量，中共初則辯稱未有平民傷亡，死傷者均係暴民、流氓，反而是有部份中共軍警遭到暴民殺害。稍後，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則表示，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只有二十三人死亡。但是根據西方新聞媒體的估計，在整個鎮壓行動中喪生的羣衆少則數百，多則上千。^②中共的暴戾行為立刻引起了世界上

註① 請參閱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6, 1989, p. A2 and The Baltimore Sun, June 9, 1989, p. 18A.

註②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5, 1989, p. A10.

絕大多數國家的譴責和制裁。

美國新聞媒體對整個事件發展的報導，尤其是在五月上旬以後，扮演了相當重要——雖然並非唯一——的角色，但是這並不是一個有計畫行動的結果。蘇聯共黨領袖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前往中國大陸訪問，由於這是中蘇共之間三十餘年來的第一次高峰會議，具有相當的歷史性意義。因此西方新聞媒體特別派遣了大批重要記者前往採訪，結果却正好碰上了學運，所以才能以充份的人力、物力來報導學運發展的詳細情形。^③再加上學運後期，北平已經實施戒嚴，中共開始對新聞媒體進行管制，美國的電視媒體能夠廣泛利用現代的衛星通訊，突破中共的新聞封鎖，這才使得外界能夠瞭解事情的發展經過和六四屠殺的真相。換言之，也就是相當程度的歷史偶然，才紀錄了整個事件的真相。

這篇文章中所謂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是廣義的包括整個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間由學生所領導的民主運動，而非狹義的僅指屠殺事件本身而言。其次，有關這次民主運動正確而完整的說法應是由學生所領導的親民主運動（The student-led pro-democracy movement），文章中僅以學運或民運的簡稱交互使用，其中並不帶有任何的價值判斷，或特殊含意。另外，由於新聞媒體定義太廣，舉凡電視、廣播、報紙、新聞性雜誌均屬之，所以也必須事先加以界定，本文所謂的新聞媒體是以美國的報紙為主。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藉這一段期間美國新聞報導的內容，來說明美國輿論界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有關看法，並希望藉此歸納出一些具有參考價值的發現。

貳、媒體種類及性質分析

本文研究對象中的美國報紙包括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巴爾地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里奇蒙時報（The Richmond Times-Dispatch），今日美國報（USA Today），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商業報（Journal of Commerce），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芝加哥論壇報（The Chicago Tribune），國際前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以及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另外還包括了國家評論雜誌（National Review），共計十五種報紙雜誌。

註③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1, 1989, p. A32.

就上述報紙涵蓋的時間而言，其中由最早的四月二十一日到最遲的八月二十二日止，共計五個月，但絕大多數的報導都集中在五月和六月之間，也就是學運的高潮期間。就報紙的種類和所屬地區而言，其中包括了全美著名的一般性大報，如東岸的紐約時報（紐約）、華盛頓郵報（華盛頓）、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波士頓），以及西岸的洛杉磯時報（洛杉磯）。全國性的一般報紙則有今日美國報、國際前鋒論壇報，和專業性的華爾街日報、商業報等。另外還有地區性的報紙，如華盛頓時報（東部，華府）、巴爾地摩太陽報（東部偏南，馬里蘭州）、里奇蒙時報（南部，維吉尼亞州）、波士頓環球報（東部，麻州）、芝加哥論壇報（中部，伊利洛州），以及舊金山紀事報（西部，加州）。

其次就報紙的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傾向而言，著名的大報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均可歸納為中間帶有自由派的色彩（middle toward liberal）。商業性專業報紙如華爾街日報、商業報，以及帶有宗教性質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則因主張自由貿易、資本主義，或因宗教信仰，反對共產主義，而自然帶有自由派的色彩。其他可以歸納為自由派的報紙還有波士頓環球報、國際前鋒論壇報，和舊金山紀事報。至於著名的保守派的報紙則有據傳由韓國統一教教主文鮮明投資的華盛頓時報，以及南部保守的巴爾地摩太陽報、里奇蒙時報，和中部的芝加哥論壇報。較不帶色彩的是一般性的今日美國報，唯一的期刊國家評論則屬於保守派。

另就報紙的素質而言，號稱刊登一切可以刊登的新聞，並為歷史作見證的紐約時報其新聞品質早為世界所公認。華盛頓郵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華爾街日報、商業報、洛杉磯時報，這些報紙的新聞也因品質卓越，常為學術界所引用。其中洛杉磯時報因洛杉磯地區擁有大量的亞裔人口，所以特別以亞洲新聞見長。其餘如國際前鋒論壇報、芝加哥論壇報、波士頓環球報、巴爾地摩太陽報，和舊金山紀事報也均能維持相當的水準。較特殊的是華盛頓時報，該報由於立場的關係，採取極右的報導方式，這反而有損該報公正、客觀的形象。唯一的雜誌國家評論，其讀者羣人數雖少，但是均係美國社會各階層具有影響力的人士，如政府高級官員，和國會議員，故其影響力亦不可小覷。④再者，就這些報紙的報導內容來看，其中包括了社論（editorial）、專欄（column）、讀者來函（letter），以及政治漫畫（cartoon），其中社論的數量共有五十八篇，專欄則有二百零四篇，數量最多，專欄又可分為各該報記者具名撰寫的新聞報導，專欄作家的有關評論，以及學者、專家所發表的專門意見。讀者投書計有三十九篇，政治漫畫共有二十九則。

在研究的過程中，作者並未對專欄文章是否代表報社立場一事進行分析。新聞報導陳述事實，社論反映報社觀點，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當然不易引起爭議。但是專欄中包括了對學者專家的訪問，或是他們自己所撰寫的文章，也有由報社

註④ 以上資料係由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客座教授 Cherriel Lewis所提供，渠原係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授，目前在華講學。

專欄作家所發表的評論性、分析性文章，其中還有些以專欄形態出現的新聞性文章，其寫作的方式又是採取標準的新聞用語，諸如通常可靠的中共消息來源透露，或拒絕透露姓名的某某中共官員之類的用語（如：usually reliable sources; Chinese sources; well-informed, well-placed sources; sources who declined to be identified; or sources who spoke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屢見不鮮。除了少數報社曾明白表示某些文章並不代表社方立場之外，大部份實在令人難以研判是否代表報社觀點。在這種情況之下，若強行加以分類，既無必要，也無實質意義。所以作者只據實引述，表明某報某人持有某種觀點，或特殊看法，如此而已，並不強行加以不必要的解釋，或引申，以免犯下過度陳述（overstate）的錯誤。

最後，就整體而言，本文所蒐集的新聞媒體資料已經包括了美國所有的重要報紙，其中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有東部也有西部，有全國性也有地方性，有專業性也有一般性，而且其時間也已涵蓋了整個學運期間，可以說得上是各方意見俱陳，並無預存偏見，或取材上的偏差。所以就理論上說來，論文資料應已相當齊全，應當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足以說明美國新聞媒體（報紙），或民意，對整個「天安門事件」的立場和看法。⑤

爲了行文敘事的方便起見，本文將把整個美國新聞界有關「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報導內容予以約略的劃分爲幾個大項：如學運的本質，失敗的原因，中共的鎮壓行動，可能對中共造成的影響，中共政局的未來走向，美國的立場和制裁措施，中共——美國的雙邊關係，以及美國新聞界的自我反省等等，然後再逐一予以說明。

叁、有關學運本質和失敗原因的報導

和臺灣的新聞媒體比較起來，美國的報紙對學運的發展過程著墨不多，並未逐日詳細報導民主運動的各項發展細節。這可能是因爲在民主運動初期，美國報社在中國大陸的人力、物力配置不足，駐北平記者的華語能力有限，因而無法進行充份而深入的報導有關。當然也可能和報紙的取材、編輯方向，或者是注意的焦點有關。但是美國報紙對整個運動的本質掌握的還算正確，對於這次學運，多數媒體認爲學生的要求非常溫和、理性，甚至還有點天真（naive）。⑥認爲中國大陸在經過

註⑤ 本文所有資料來源係由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駐外單位匯整，或由該局委託之美國公關公司 The Hannaford Company, Inc. 蒐集報同供國內參考之用，計兩大冊四三八頁，全稱爲「美國重要報紙對中國大陸天安門事件之社論及專文」。

註⑥ The Baltimore Sun, June 9, 1989, p. 18A.

了十年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人民初嚐相對較為改善的精神和物質生活，但也面臨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和貪污腐敗，民心確實有思變、求變的現象。在此情形之下，學生把抽象的民主概念，再加上一般人民對現實生活的不滿結合起來，也就是把政治性的訴求和經濟性的不滿互相結合，這才是這次示威之所以贏得廣大羣衆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⑧

華盛頓郵報也曾指出，北平的示威是多面性的，並非單純的中共高階層權力鬭爭，或是羣衆追求民主所可解釋，其中應該還包括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衝突，以及世代之間的變化（generational change）。^⑨該報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如果沒有鄧小平十年來的經濟改革，就不會有今日的民主運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相對改善了部份中國大陸人民的經濟生活，但隨之也帶來了通貨膨脹，和貪污舞弊的惡果，而這其中又以城市居民受害最重，於是他們起而要求整飭經濟秩序，追求更大的政治自由。^⑩

和美國前總統尼克森一起打開中共大門的前國務卿季辛吉也曾就這次學運在報上發表意見，他認為如果追根究柢分析這次學運事件，還是必須由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政策開始談起。鄧小平由一九七九年起所推動的改革，釋放出了禁錮已久的社會活力，經濟的成長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是經濟改革也導致不少流弊，社會不公的現象日漸增加，市場經濟和中央計畫經濟並行的雙軌制度造成了不肖共黨官員上下其手的機會，過熱的經濟景氣又引發了高達兩位數字的通貨膨脹，物價改革使得部份人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引發了不滿的情緒。而門戶開放政策增加了中共和西方國家的接觸，大批留學生出國深造，帶回了西方民主自由的觀念，並逐漸開始以此標準來衡量中國大陸上仍然相對落後、封閉、保守的社會。政治性的不滿和經濟性的不平這兩種因素一經結合，終於形成了這次大規模的示威行動。^⑪

簡單的說，由於門戶開放，和經濟改革增加了人民對未來的期望，但他們對現實的不滿情緒也隨之昇高。其實這正合乎政治學大師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著名理論，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人民對政府的主觀期望昇高，但是政府的客觀能力並未隨之增加，有時反而因為來自社會其他層面的干擾，壓力增加，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甚至因而減少，結果兩者之間的差距加大，引發人民的廣泛不滿情緒，如果此一不滿情緒壓抑，或累積到了某一程度，則將引發事端。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共成了本身成功（如果可以說得上是成功的話），或經濟改革的受害者（Beijing becomes a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⑫這也與社會學的基本理論相吻合，依據學理，任何一個政府，尤其以專制，或者威權政府為然，

註⑧ "The Chinese Turmoil,"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30, 1989.

註⑨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5, 1989, p. A27.

註⑩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1, 1989, p. A1.

註⑪ *The Baltimore Sun*, June 5, 1989.

註⑫ 轉錄自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1, 1989, p. 1.

當其開始進行改革的最初階段，就是其存亡絕續的最緊要關頭。改革的初期，既有的權威體制瓦解，或控制能力減低，壓抑多時的社會活力驟然之間釋放出來，新的控制機制尚未成熟，自約能力不足，結果社會顯得一片混亂，政府及人民都需要調整、適應的時間。但是這一類的政府往往又都是在與時間競賽，政府多年來一再抗拒，或拖延改革的結果，使得人民已逐漸喪失耐心，稍一處理不慎，就會引發事端。當年的伊朗巴勒維王朝，當前的東歐和蘇聯情勢，以及中共的改革都足以說明這個事實，甚至臺灣，以及南韓的艱辛改革過程也並不例外。^⑫

學理已足以說明改革的艱辛，但是更糟的是鄧小平的改革政策僅局限在經濟的層面，一度甚囂塵上的所謂政治改革，事實上只是行政改革罷了。事實顯示，鄧小平在經濟方面雖然持較自由、改革、開放的態度，但是在政治上仍然相當的保守。換言之，即或連鄧小平這樣的改革派領袖也未能瞭解，威權式的共產獨裁統治無法使市場經濟奠基，只著眼於經濟改革而未及於政治改革，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製造了更多、更複雜的問題。^⑬中共的錯誤在於只求經濟的改革和現代化，而未同時解放對政治的束縛，追求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現代化而無政治的民主化加以配合，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中共改革過程的一波三折。

多數的美國報紙均未談及這次學運失敗的原因，其中唯一的例外是華盛頓時報，該報指出學運失敗的重要原因包括：第一，中共的領導階層在面對個人生死存亡、政權存續的危險關鍵時刻，還能捐棄成見，團結一致；第二，中共仍然能夠有效的控制軍隊，贏得共軍的效忠，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性因素；第三，示威羣衆缺乏強而有力的領袖（如孫中山先生），並且準備於必要時進行武力對抗；第四，學生仍然承認中共政府的合法性，並且未能充分瞭解政府、軍隊仍然操控於中共元老手中的含意。^⑭除了這些因素之外，再加上學生本身的技術性錯誤，部份要求（如要求李鵬、鄧小平下臺）超出中共所能容忍的範圍，而且未能及早在情勢仍然許可，中共已然有讓步跡象的情形下，迅速結束示威行動，結果終於導致這次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的慘然失敗。

另外，也有媒體指出，學生雖然志在追求民主，但並未真正瞭解民主的本質，因為學生的行事方式和民主的方法大相逕庭，而民運的組織架構也正和他們所抨擊、要改革的對象相類似。^⑮示威學生除了反官倒、反貪污、反腐敗的一般經濟性訴

註⑫ Kingdoms fall when they start to reform. And the most critical moment for bad governments is the one which witnesses their first steps toward reform.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9, 1989, p. A27.

註⑬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 1989, p. A21.

註⑭ *The Washington Times*, July 20, 1989, p. F4.

註⑮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0, 1989, p. A23.

求之外，其他還有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較具政治性的主題。但是天安門廣場上以學生為主體的示威羣衆對於訴求主題（民主）似乎並無特別了解，也未見他們對此進一步的加以引伸，或予以說明。美國新聞媒體的這種評論似乎並非全然無據，正如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貝濟曼（Arnold Beichman）所說，示威學生缺乏持續、有效的意識形態，以及理論的支持，無法長期動員羣衆，這由學運後期，羣衆激情已失，高潮逐漸退去可以看出。^⑭雖然這裏所說的意識形態和理論，並不必然是狹義的僅指民主、法治而言，但是鑑於這些問題確實是學生訴求的重點，學生未能將民主法治的抽象觀念予以進一步的引伸，並且加以落實在日常的活動和組織中，這自然不能不說是一個相當令人引以為憾的缺陷。

肆、有關流血鎮壓、影響及中共未來的發展方向

至於中共為何對示威羣衆採取殘酷的流血鎮壓方式，由於中共仍是一個人治重於法治的極權政體，政府決策不受任何的民意監督，目前並無充份、而且可靠的資料可供進行系統性的學術研究。中共辯稱缺乏鎮暴裝備和訓練，並且自認爲了維持社會的安定，打擊一小撮壞份子，在「外國敵對勢力」影響下的「反革命叛亂」活動，中共必須以明快的方式加以處理，「絕不手軟」。但是美國報紙均未接受中共這種荒誕不經的說詞，對於中共的屠殺行動，所有美國報紙，不論立場是自由派或保守派，不管是屬於東部或西部，全都對中共予以強烈的譴責，即或連親中共者如尼克森、季辛吉、蘭普登（David M. Lampton）、及蘇利文（Roger Sullivan）等人，也難以爲中共辯解。^⑮

在屠殺行動尚未發生之前，季辛吉曾經在報上撰文表示，中共領袖對於動亂成因似乎並無歧見，只是對於處理方式有不同的看法。季辛吉曾特別提及鄧小平本人在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經驗，所以他特別擔心中國大陸再度陷於動亂之中。而且他的經濟改革也亟需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因此鄧小平主張穩定重於一切，認爲中共必須盡一切的可能來維持政治和社會的安定。季辛吉表示很難相信鄧小平會背棄其改革的初衷，毀壞其一生的事功，使中國大陸再度陷入其所亟欲避免、類如文化大

註⑭ *The Washington Times*, July 20, 1989, p. F4.

註⑮ 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打開了中共的大門，季辛吉時任尼克森之國家安全顧問，現與中共有商業上往來，彼等二人長期以來均被視爲中共之友人。蘭普登現爲紐約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總裁，而蘇利文則是華府美中商業委員會的總裁，（有關內容請參閱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10, 1989, p. 18, *The Baltimore Sun*, June 5, 1989, and *The Washington Times*, June 26, 1989, p. D1.

革命的長期動亂之中。^⑨季辛吉最後並且表示，他必須相信鄧小平瞭解此一情形，並且最後終將能夠尋求方法，把因經濟改革和教育發展而形成的新的社會動力，融入中共的權力體系之中。但是他傾向支持中共的主觀願望畢竟和客觀的事實仍然有段距離，屠殺行動還是發生了。

芝加哥論壇報指出，中共的保守派份子把學運視為對中共政權的挑戰，當示威的羣衆不斷增加，範圍逐漸擴大，訴求更形尖銳，這就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信念，證明學運確實是反革命的叛亂活動。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探視示威學生，表示「來遲了」，又使得保守派認為此事涉及權力鬭爭，而鬭爭來自黨內高層。趙的被迫去職，增強了中共黨內的保守派勢力，在沒有不同意見的情形下，中共終於採取了殘酷的鎮壓行動。^⑩但是即或保守派中共領袖的疑懼都是事實，這也不代表中共必須以流血屠殺的方式來鎮壓、打擊這次民主運動。因為畢竟仍有其他的選擇方案，中共可以採取其他的方法和步驟，以和平對話的方式，甚至分化離間，或至少也用僅次於流血的方法來處理這次學運。結果中共不此之圖，却採取了最笨拙、最血腥的鎮壓方式，實在是不得不使人對中共的決策能力、品質、過程和判斷能力抱著嚴重的懷疑態度。

持平而論，鎮壓行動可能使中共付出沉重的代價，包括：對內，中共可能必須面對中國大陸人民消極的反對，和冷漠的抗拒；政權的穩定性可能受到影響，引發內部廣泛、持久的權力鬭爭，造成社會動亂；經濟改革也可能遭到波及。對外，鎮壓行動可能使得臺灣和香港對中共信心盡失，其多年來所一再推銷的「一國兩制」將更不易取信於這兩個地方的居民；中共可能遭到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西方國家對中共的科技轉移和經貸款，也可能受到影響，使其經濟改革受到影響。就理論上而言，中共理當在採取行動之前應對武力鎮壓所可能引發的這些不良後果，和國際上的可能不良反應有所評估，中共不可能貿然採取這麼激烈的手段，而未事先加以評估。紐約時報對此亦持相類似的看法，認為中共必然對可能發生的整個情形了然於胸。^⑪

鄧小平等人既然可能知道，激烈的鎮壓行動會造成許多困擾，也必然會激怒一向標榜人權的西方國家，中共可能因此遭到某些制裁，那麼中共領袖為何仍然決定斷然進行武力鎮壓？當然中共可能確實認為政權的存續受到了威脅，社會的安定岌岌可危，只好不顧可能的制裁，而採取斷然的行動。但是另外一種可能則是中共領袖仍有所謂的「中國種族中心主義」(China Centralism)的思想，紐約時報引述專家的意見以「乾隆情結」(Qianlong complex)稱之。鄧小平這些人可能

註⑨ "In the End, It Was Fear of Chaos", *The Baltimore Sun*, June 5, 1989.

註⑩ *The Chicago Tribune*, July 25, 1989, p. 13.

註⑪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89, p. A6.

仍然認為以中國的地緣戰略位置、人口和面積、外國需要中國、世界各國無法承擔將中國孤立的後果，^②所以中共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違反世界潮流，悍然以流血屠殺的方式，鎮壓了這次由學生所領導的民主運動。另外一種可能就是中共這些元老幹部早已和社會及現實脫節，所以才會以五十年代的辦事方式，來處理八十年代的事情。由於中共領袖缺乏處理這麼大規模示威行動的經驗，所以只好率由舊章，基於自身以往的「革命」經驗，仍然採取過去四十年來它或多或少一直都在利用的相似方法，來對付這次學運所引起的社會騷亂和不安。^③

在對內影響方面，許多報紙會由不同角度指出，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未能將權力鬭爭予以制度化，加以適度的規範，鎮壓行動再度破壞了鄧小平的權力繼承計劃。^④「六四事件」之後，中共軍方勢力高漲，這將使鄧小平過去十年來使軍隊退出政治的努力受損。^⑤中共的暴行使得海內外所有中國人憤怒之外，也為之蒙羞，^⑥這次悲劇性的事件只會導致中國大陸人民對中共政權的憎惡和不信任。隨之而來的政治壓迫，和個人權利受到侵犯，將影響未來一、二年中共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安定。^⑦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的政局將轉趨緊張，將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但是政權的轉變可能將是一段長遠的路程。^⑧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由中國傳統政治的角度指出，中國一向缺乏民主的素養，近一世紀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曾致力於對此一問題的探索。他悲觀的認為中國由專制走向民主的路途將非常的艱辛困難與充滿血腥。^⑨

立場保守的巴爾地摩太陽報則明白指出，中共以軍隊屠殺本國百姓，這個事實說明中共政權毫無希望，已經喪失了合法性，歷史終將予以審判，被害民衆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英雄。這些爭權元老將遭歷史譴責，鄧小平本人的歷史性改革也將無以彌補此一罪愆，中國人民終將再起。^⑩總而言之，中共的遠景確實暗淡，未來難以推測，變局可以預見，關鍵仍在必須建立一個可使中共繁榮、成長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但在當前這種壓迫性的中共政權控制之下，面對心懷憤懣、遭到激怒、拒絕

註②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89, p. A6, and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5, 1989, p. 19.

註③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89, p. A6.

註④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0, 1989, p. A23.

註⑤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1, 1989, p. 1.

註⑥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6, 1989, p. A23.

註⑦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1, 1989, p. A1.

註⑧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2, 1989, p. A19.

註⑨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89, p. A. 1

註⑩ *The Baltimore Sun*, June 9, 1989, p. 18A.

合作的人民，想要實現這個目標實在是談何容易。^④

除了這些一般性的見解之外，亦有媒體指出，六四天安門事件對中共的國際聲望和經濟改革目標，都是一項嚴重的打擊。短期之內中共的經濟發展將陷於停滯，觀光事業受損，遊客大幅減少，外資的輸入和科技的轉移均將受到影響。臺灣和香港居民對中共的承諾將完全喪失信心，這不僅是因為屠殺行動的本身，而且還包括了對中共領袖的判斷能力，和政權的成熟程度的懷疑在內。^⑤美國前駐中共大使羅德（Winston Lord）更進一步的指出，在第一波的恐怖高潮過後，大批的中共留美學生可能拒絕返回中國大陸，曾受西方訓練的科學家可能亟欲出國，這將對中共造成第二波的打擊。^⑥另外，在當前蘇聯戈巴契夫及東歐的改革政策之下，中共在世界權力平衡中所扮演的角色將相對降低，影響力將較為衰弱，在未來的二、三年內，中共不太可能在國際政治和戰略上有太大的份量。^⑦

部份報紙也反映了美國政府官員，和某些學者專家的看法，認為中共強硬派的鎮壓行動不會生效，當前被壓制的改革派遲早將會復出。^⑧在可預見的未來，雖然中共只會進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但是中共——尤其是鄧小平，也深知唯有仰賴西方的科技和資金援助，中共才有可能在公元二千年的時候達成既定的經濟目標，中共已經不可能逆轉當前的改革方向，必須持續對外的門戶開放政策。^⑨關於這點倒是確實可由中共官員日後所發表的談話中看出端倪，各級中共幹部於鎮壓行動之後，確曾一再利用各種機會反覆重申，中共既定的改革、開放政策是不會有所改變。中共的迴旋餘地相當有限，除了繼續執行其既定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外，中共似乎並無太多的選擇。

有關中共政權短期內的可能發展方向，曾任美國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的赫爾布魯克（Richard C. Holbrooke）在六月七日於紐約時報撰文指出，中共未來的發展方向有四，第一是鎮壓失敗，改革派復出，最後導致中共一黨極權統治的結束；第二則是匈牙利模式，類如一九五六年史大林鎮壓匈牙利革命之後，強行恢復了秩序和安定，安置了一個傀儡總理，接著再進行有限度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但是其極權控制則未見放鬆；第三是史大林模式，中共重返毛澤東時期的極左政策，高壓整肅，恐怖鎮壓相繼出籠，李鵬這些強硬派領袖可能認為，高壓統治可以控制心懷不滿的羣衆，但是經濟改革將受到波及

註④ *The Chicago Tribune*, July 25, 1989, p. 13.

註⑤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6, 1989, p. A21.

註⑥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0, 1989, p. A14.

註⑦ "A Weakened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5, 1989.

註⑧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1, 1989, p. A32.

註⑨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1, 1989, p. A1.

；第四爲全面的內戰和騷亂，中共陷於分崩離析的情況。^②他認爲中共最可能出現的情形是匈牙利模式，此一觀點雖然有部份正確之處，但他推測中共改革派領袖可能於一年之內復出，目前看來顯然是太過樂觀的估計。

總而言之，「六四天安門事件」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再度顯露了一個事實：中共政權爲了維護本身的利益，它可以採取出人意料之外的「必要的殘酷手段」。華爾街日報據此引申出一項重要結論，該報認爲自由世界應由「天安門事件」中學到教訓，要了解即或共黨進行改革，但是其本質並未改變，不能容忍對其獨佔權力的任何挑戰，自由世界必須切記是與一個可怕、有武力的團體打交道，它有能力以暴力的方式來保護本身的生存。^③華盛頓郵報亦明確指出，美國必須正視中共是一個共產國家的這個事實，中共對維持其獨裁統治的關切遠甚於它和美國的戰略利益。^④就中共的立場而言，槍桿子出政權的原則今昔並未有所不同，經驗顯示人民是可以武力鎮壓的，西方的制裁方式可能是選擇性的，時間和效果則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政權本身的得失却是無可妥協、不能讓步的。^⑤中共領袖仍然認爲政權的得失、權力的掌握，遠較對人權的尊重、生命的尊嚴更爲重要。

伍、媒體對美國制裁措施的看法

在六月三日深夜、四日凌晨的鎮壓行動發生之後，經過電視新聞媒體的轉播，中共的暴行立刻引起世界各國的強烈反應，西方國家相繼採取了制裁措施，美國總統布希於六月五日下午令對中共進行有限度的制裁，布希所宣佈的制裁措施包括：(1)停止對中共的所有武器出售，包括政府對政府，以及民間的商業出售在內；(2)停止美國與中共軍事人員的交換訪問；(3)關於中國大陸留美學生要求延長居留時間的申請，將優予考慮；(4)經由紅十字會，對在鎮壓行動中受傷的學生和民衆，提供醫藥及人道的援助；(5)在中國大陸的局勢未明朗化之前，繼續檢討美國與中共間的雙邊關係。^⑥布希總統的選擇性制裁措施顯得節制、溫和，布希在用詞遣字方面也再三斟酌，一方面要表達美國的不滿、羣衆的憤怒，另一方面又不願意破壞美國與中共十餘年來所苦心經營的雙邊關係。

註②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7, 1989, p. A1.

註③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3, 1989, p. A14.

註④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8, 1989, p. A17.

註⑤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1989, p. A23.

註⑥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7, 1989, p. A21.

所有的美國報紙不論立場如何都對中共的鎮壓行動表示非常悲痛，並且強烈加以譴責，憤怒之情可謂溢於言表。各報紛紛發表專文，表示支持布希總統的有限制裁措施，強調只要中共繼續這種暴行，中共與美國的雙邊關係就不可能恢復正常。立場右傾的華盛頓時報主張，應讓中共為其暴行付出代價，它批評美國以雙重標準對待中共，委屈求全，但是美國所謂的「中國牌」和戰略利益的考慮經不起事實的分析。就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美國應該堅持自由、民主的原則，而不是短期的政治利益。該報並且進一步批判了美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認為他們不瞭解共產主義，對中共的暴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至曲意予以維護，為其辯解。^④保守的巴爾地摩太陽報亦對西方對中共不良的人權紀錄採取雙重標準一事提出批評。^⑤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則更進一步的以南非為例，明白指出聯合國對中共也有雙重標準，對中共暴行的公開譴責和制裁，雖然必遭中共的否決，但是聯合國仍然應該表達本身的立場，今天大家對中共暴行的節制、保留的態度，仍是因為擔心損及與中共的關係。^⑥所有的報紙都贊成美國，甚至全世界的文明國家都對中共採取某種程度的制裁措施。

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指出，當蘇聯的改革遠景正日趨光明之際，中共的暴行實在令人痛心，美方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對中共政策目標是針對圍堵蘇聯，在當前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很難自圓其說其對中共的政策，美國必須重新檢討其對中共的政策。^⑦但是該報也明確指出，美國的制裁行動不會有太大的實際效果，無法在實質上協助美國想幫助的中國大陸百姓，也不會產生預期的政治效果。美國制裁的目的只是要用超過言論批判的方式，來表達道德上的憤怒，只是讓自己覺得好過些罷了。^⑧里奇蒙時報也持類似看法，認為美國既不可能和中共斷絕外交關係，也不可能和中共打仗，美國的經濟制裁效果將是非常有限，只能滿足自己的道德標準罷了。^⑨

也正就是因為制裁行動不易發生實質的效果，再加上對美國國家長遠利益和戰略的考慮，所以幾乎所有的報紙都支持布希的有限制裁方案。甚至連保守的華盛頓時報也認為布希的有限制裁措施相當理性，禁止軍售和雙方高層官員互訪，將有助於分化共軍內部。布希明智的未予以經濟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制裁，因為這將傷及中國大陸人民，有害中國大陸民主觀念的發

註④ *The Washington Times*, June 7, 1989, p. F1, June 16, 1989, p. F3, and June 22, 1989, p. F1.

註⑤ *The Baltimore Sun*, June 9, 1989, p. 18A.

註⑥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9, 1989, p. 18.

註⑦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5, 1989, p. A10.

註⑧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1989, p. A23.

註⑨ "China: Will Pressure Work?", *The Richmond Times-Dispatch*, June 22, 1989.

註⑩ *The Washington Times*, June 7, 1989, p. F2.

展。^④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甚至強調，中國雖然缺乏政治自由的傳統，中共的改革將來可能仍然是進一步退兩步，但是民主終將勝利。美國與中共間的學術交流非但不應減緩，反而應該予以持續，甚至加強。對中共留美學生的簽證問題應該謹慎處理，不能讓他們被送入中共的監獄，但是如果他們都留在美國，這將對中國大陸民主思潮的發展發生不良影響。^⑤紐約時報也以社論的方式表示支持布希節制、理性的制裁措施，因為這兼顧了美國信守的原則，也考慮了制裁的有效性，但是該報仍然認為布希的表達方式似乎可以更為強硬，以反應美國人民的憤怒和不滿。^⑥

至於反對對中共採取進一步制裁措施的人則可以尼克森、蘇利文這些人的觀點為代表，尼克森在華盛頓時報上撰文表示，對中共的制裁如導致中共重返孤立世界，或倒向蘇聯，或造成其經濟改革失敗，這將(1)不合乎中國人民的利益；(2)不合乎海內外要求中共政治改革的中國人的利益；(3)不合乎美國的利益。他仍然堅持其一貫的立場，認為一個強大、安定的中共合乎美國的安全利益，有助於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衰弱、分裂的中共將使蘇聯成為太平洋地區唯一的軍事力量，而日本則成為唯一的經濟強權，這都不合乎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美國應該利用其影響力，使中共維持經濟改革的政策，並進行和平的政治改革，美國應避免公開的指責，教導中共行事的方式，而應透過私下的管道和中共進行溝通，尼克森的看法無疑的反映了他一向的立場和主張。^⑦

六月十一日，一未具名作者（據判斷是季辛吉）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指出，除非中共重返（或維持）現代化的道路，中共將陷於紛亂，並將回到以往的孤立世界，與外界隔絕，經濟將陷於停滯，這正是使中國陷於永遠積弱不振的主要原因。美國需要協助中共重返國際社會，一個現代化及強大的中共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有本身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自然應該予以尊重，並應適時加以強調，但是美國應該瞭解中共對於外國的壓力和干預極為敏感，他並以一九六〇年代中蘇共交惡為例，說明中共不會在壓力之下屈服。因此布希的節制行動非但不應受到批評，反而還應該受到讚揚，該文作者並且鼓勵布希總統應該小心行事，勿在民意（國會）的壓力之下採取進一步制裁措施，或發表不當的刺激性言論，因為這只會破壞美國和中共的長遠友好關係。^⑧

另外，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則刊載了蘇利文和蘭普登的意見，他們反對對中共的制裁行動，但是他們又無法舉出有力的理由，也無法對中共的暴行加以解釋。他們反對制裁的理由包括：(1)國際上已對中共逕行加以制裁，已經對中共構成傷害，美

註④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21, 1989, p. 19.

註⑤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2, 1989, p. A22, and June 27, 1989, p. A22.

註⑥ *The Washington Times*, June 26, 1989, p. D1.

註⑦ "The Drama in Beijing,"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1, 1989.

國的單方面行動可能無效，只是自欺欺人，只能滿足自己道德上的優越感。美國應和其他國家協調，不要貿然行動，而損及與中共的長遠關係；(2)有時候採取較少的行動，反而是更大的懲罰。^⑤但是該報在文章結束時，曾特別註明文內的意見只代表他們二人的觀點，並不代表報社的看法。坦白的說，前述二人的解釋遠較尼季二人的務實觀點還缺乏說服力，實在不足以充份解釋為何美國不應進一步制裁中共之理。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紐約時報曾刊登了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退休華裔王姓 (Chi-Chen Wang) 教授為中共鎮壓行動辯護的文章。該文標題為“Chinese Hardliners Did the Right Thing”，這位教授辯稱，過去的四十年是本世紀裏中國唯一的一段穩定時期，也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長、最有效的一段政府統治時期。中共使中國大陸經歷了無與倫比的成長，和相對的繁榮，生活雖然簡樸，但是却較少飢饉之虞。人們需要安定，寧願接受當前的中共政權，而不願冒險接受不確定的未來，和另一個新的政權。示威羣衆的行動絕非和平，他們攔阻交通、焚燒車輛、拒絕服從解散的命令，目的是要推翻中共政權，所以中共保守派領袖採取鎮壓行動毫無錯誤，因為流一點血總比全面的內戰要好。中共的錯誤不在鎮壓了這次學運，而在未能及早及時採取鎮壓行動。^⑥這位教授的說詞簡直比中共官方的辯解之詞還要強硬，在全美各界都一致譴責中共的暴行聲中，他的這篇文章確實是個異數。結果立刻引來了大批讀者來函加以抨擊，所有來函無一例外的都是對其偏頗的立場加以譴責。^⑦

關於布希之所以只採取有限制裁措施的原因，一般報紙均認為其主要的考慮仍是中共的可能戰略價值，美國擔心中共重返孤立世界，更趨極端，這樣將對世界，尤其是亞洲的安定不利，損及亞洲的權力平衡，有利於蘇聯。除此而外，美國也擔心雙方關係的惡化會損及美國在中國大陸的監聽站，以及美國透過雙邊關係可以對南亞發揮的影響力，所以美國必須不計代價的維持苦心經營的雙邊友好關係。^⑧但作者個人認為布希立場軟弱的其他原因還應包括：他曾經擔任美國駐中共代表，與中共關係密切，仍然存有「中國牌」的觀念。布希自認為瞭解中共，與中共領袖如鄧小平等人相熟稔，對中國人民擁有特別的感情，所以他希望努力避免與中共發生摩擦，不願損及雙方的關係。再者，這也可能和布希一向謹慎小心的個性有關，他唯恐對中共的譴責用詞遣字失當，觸怒了中共，使雙方的關係更形惡化，布希可能認為輕率不當的表示意見並非良策，行動

註⑤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10, 1989, p. 18.

註⑥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4, 1989, p. 23.

註⑦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0, 1989, p. A16.

註⑧ 請參閱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1, 1989, p. 1. and “China: Lust for Revenge”, June 16, 1989.

才是最可靠的制裁方法。^④但是事實顯示，布希節制、有限的制裁措施，以及後來單方面的示好行動，並未贏得中共太多善意的回應。布希總統的中共政策看來確實仍有不少值得檢討之處，這也難怪代表民意的美國國會要一再嘗試透過立法程序，進一步對中共施加壓力了。

陸、報紙對學運的檢討及自我反省

無可諱言的，在報導這麼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的過程中，美國的新聞媒體也和政界及學界一樣，（無可避免的）發生了不少報導和分析上的錯誤，其間甚至還出現了不少臆測之詞。部份報紙事後曾對此進行檢討及自我反省，報界同時也對美國政界及學界未能預見此次學運的發生、規模和中共的殘酷鎮壓行動、判斷錯誤而有所批評。

除了前面曾經提過的一些比較可以原諒的分析性錯誤之外，報上還有一些其他的明顯錯誤。在鎮壓行動發生之前，報上曾預測學生、工人和知識份子可能形成反對性政黨組織。^⑤也有人認為由於資訊時代的來臨，世人可以親眼看到北平局勢的演變，這將使得中共領袖無法以殺戮、逮捕的方式來處理這次民主運動。^⑥中共問題專家也認為以示威的規模、羣衆的支持程度、中共軍警的同情態度，再加上缺乏處理羣衆運動的經驗，他們相信中共採取武力鎮壓的可能性很小。^⑦愈接近六月三日、四日，消息愈顯得凌亂，愈不確定。六日，芝加哥論壇報報導，趙紫陽仍然受到中共黨內保守派的支持，盛傳鄧小平死亡，中共第三十八軍和二十七軍發生衝突。^⑧八日，巴爾地摩太陽報指出，中共可能陷於軍閥割據，或更壞的情況。^⑨九日，華盛頓時報也報導，中共軍隊分裂，中國大陸可能發生內戰，形成軍閥割據等等。^⑩簡單的說，美國的報界、學界和政界都未能正確預見中國大陸人民對中共的不滿情緒是如此高昂，既未能預見學運初期的成功和其所波及的層面，也未正確判斷出中共會採取武力鎮壓的手段，就整個事件來說真是錯的相當離譜。^⑪

註④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1, 1989, p. 32.

註⑤ "The Chinese Turmoil",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30, 1989.

註⑥ *The Washington Times*, May 19, 1989, p. F2.

註⑦ *The Washington Times*, May 12, 1989, p. F1.

註⑧ *The Chicago Tribune*, June 6, 1989, p. 17.

註⑨ "The Myth of China", *The Baltimore Sun*, June 8, 1989.

註⑩ *The Washington Times*, June 9, 1989, p. F3.

註⑪ 詩倫恩 *The National Review*, July 14, 1989, p. 60.

至於爲什麼會發生這麼嚴重的判斷上和分析上的錯誤，可以歸納成下面幾點理由。首先，就像前面所曾經提過的，中共仍是一個專制獨裁的極權政體，人治重於法治，政治的運作、權力的分配，一切均在幕後進行，沒有既定的標準和制度可供依循，或據以研判。外人（尤其是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國人而言）只能根據有限的蛛絲馬跡、零散的資料加以分析，實在很難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其次，可能應該歸因於部份美國學者專家迄今在心態上仍然不願接受中共是個共產極權國家的這個簡單事實有關。他們總是認爲中共所主張實行的共產主義與蘇聯或其他共產國家的模式不同，中國人民對自由民主的標準和要求與西方不同。所以對於中共應有不同的衡量標準，這種雙重標準的觀點無形中可能也影響了他們對中共事務的判斷能力。另外，其中可能還有文化上的因素存在，傳統上，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者就有一種容易受到中國歷史文明影響的傾向，驚訝於中國文明的博大精深，比較容易對其研究的對象發生感情，所以每易受到個人感情的影響，再加上受到哈佛燕京學派費正清遺風的影響，因此對中國（中共政權）總是持著相對較為寬容的態度。而這點正好和研究蘇聯問題的學者相反，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每有痛惡蘇聯的傾向，所以對蘇聯往往持著較為批判的態度。

學運過後，美國的報紙開始對政府、學者對這次民運的看法，甚至媒體本身的報導進行檢討和批評。華盛頓郵報即曾刊載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寇克派翠西克（Jeane Kirkpatrick）的檢討性文章，質疑爲何所有的專家、學者均未能預見學運的規模會如此之大，延續的時間會如此之長？爲何未能正確判斷中共共和鄧小平居然會動用軍隊屠殺示威羣衆？又爲什麼對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所知是如此的有限？^④根據寇克派翠西克的看法，她認爲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共政治的運作仍然是一片黑幕，政治上的競爭並未制度化，政策的形成、領袖的更替均無規則可循。她認爲只要中共的權力未經規範，競爭以及政策制定未能制度化，只要理性和法律未能超越對武力的迷信，美國的所有學者專家未來都可能再度碰上相似的尷尬情形。^⑤

華盛頓時報在六月九日以「中國專家的水晶球破了」爲題發表專文批評有關美國學者專家的錯誤看法。該報並訪問了許多位中國問題專家，其中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鮑大可（A. Doak Barnett），和哈佛大學的艾伯史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傳統基金會的史蒂迪（Steven Mosher）、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凱德爾（Albert Keidell）和作家西爾（Orville Schell），他們全部同意大部份的中國通確實都會對學運和中共作法判斷錯誤。他們認爲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由於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有一種輕易相信北平政權的傾向，因爲他們對東歐和中國革命抱持著同情的態度，結果使得他們對中共的批評非常敏感。而且他們和中共方面的學者專家，甚至中共政府本身往來密切，建立了良好的溝通管道，人們有一種自然的

註④ "The Beijing Spring",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1989.

註⑤ 同註④。

傾向，比較容易相信自己所認識的人和熟悉的事物，他們不願損及這種關係。^{②9}

芝加哥論壇報則在六月十五日指出，美國學者、官員、民間，甚至新聞媒體都不願面對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中共政權殘酷的本質。該報痛斥美國虛假、偽善的可恥面貌，該報由早期的費正清、戴維斯對中共的錯誤看法，一直罵到目前學者短視、虛偽、視而不見、逃避事實。^{③0}華盛頓郵報亦分別在七月二日和三十日對新聞界的報導內容是否正確提出檢討，對報界未能預見事件的發生加以質疑，反省新聞媒體是否不當挑起了示威羣衆的不切實際的期望，該報並將原因歸結於太過於依賴官方的訊息，對共黨的特性了解不足，但仍然認為西方新聞媒體是在可能的情況之下，儘可能的提供詳實的報導。^{③1}

柒、結語

由於媒體性質使然，報紙的功能在於報導事實，去偽存真，分析事件的前因後果，為讀者提供正確（新聞），而有深度（評論、分析）的訊息，報紙的分析內容並非學術研究的結果，不必然正確，但是對事實的報導則應盡一切的可能追求真實，評論則應保持中肯、負責的態度。而且因為報紙所提供的消息可能成為歷史的見證，所以尤其不應因為本身的立場，及意識形態而扭曲事實真相，歪曲報導。本文所研究的各報基本上均能把握此一原則，但是由於各報風格有異，水準不同，所以還是出現了一些差異。其中以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最為深入、嚴謹、理性。華爾街日報等經濟性專業性報紙則理所當然的較偏向於六四事件對經濟方面的影響。今日美國報內容短小精簡，深度明顯不足。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多刊載專家的意見，並以人性化、說故事的報導方式，來說明參與示威羣衆的活動和感受。其中比較特殊的是華盛頓時報，該報使用了不少情緒性的字眼，如魔鬼、野蠻、邪惡、吸血、派系（clique）來形容中共，這顯然應該和它的極右政治立場有關。^{③2}

除此而外，作者還發現美國新聞媒體在報導「六四事件」時，除了立場極其右傾的華盛頓時報，和保守的芝加哥論壇報之外，幾乎很少有報紙提及臺灣方面對學運的看法、作法和反應。而自由派的舊金山紀事報甚至還有一篇對臺灣相當不友善的文章，認為臺灣企圖利用此一機會來改善本身的形象。^{③3}另外也很少有報紙談及中共內部高階層權力鬭爭（重整）的情形

註②⑨ "China Experts' Crystal Balls Shattered", *The Washington Times*, June 9, 1989.

註③⑩ *The Chicago Tribune*, June 15, 1989, p. 23.

註③⑪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 1989, p. C6, and July 30, 1989, p. C5.

註③⑫ *The Washington Times*, June 9, 1989, p. F3.

註③⑬ 請參閱 *The Washington Times*, May 12, 1989, p. F1, *The Chicago Tribune*, June 25, 1989, p. 19 and "Taiwan Using China To Boost Its Image",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y 17, 1989.

，唯一的例外是芝加哥論壇報七月二日的一篇文章，但是該文作者是一名華裔學者。^①這個簡單事實說明了美國新聞媒體報導涵蓋的層面、深度、廣度均仍有不足之處。

綜合而言，在研究中作者發現，美國的報紙由宏觀的角度分析了學運的起源，推測鎮壓行動可能對中共造成的負面影響。它們都對中共以殘酷手段、流血鎮壓這次民主運動一事，表示了極大的憤慨，支持美國的適度制裁行動。所有的報紙都承認維持中共與美國關係的重要性，但也要求美國政府應該明確的傳達訊息，告訴中共美國反對它的非人道、違反人權的暴行。它們對布希總統的有限制裁措施都給予相當程度的肯定，認為理性、溫和、節制的行動最能合乎美國的長遠利益。即使少數要求進一步對中共加以制裁者，其前提也是如果中共拒絕改變其當前的高壓政策。換言之，感性、主觀對中共的不滿仍然必須考慮理性、客觀的現實，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和中共的關係雖然不可能恢復到「六四事件」之前一樣，但也不致於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對於學運的本質，美國報界的分析、評論尙稱中肯，認為這是中共十年經改及開放政策所造成的後遺症。人民（尤其是學生）政治上的覺醒，再加上經濟上的不滿，終於造成這次中共統治四十年來最嚴重、規模最大的民主示威運動。但是除此而外，美國報界和政界、學界一樣，在分析、判斷這次學運的初期發展、規模、涉及層面、中共可能採取對策方面，都發生了相當大的錯誤，這點倒是值得所有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者專家共同深思的。對於學運的本身，作者發現美國的能力非常有限，對於中共的制裁行動多半不能發生實際效用。對示威羣衆、學生最多只能給予道義上、精神上的支持，發表一些原則性的、抽象的口頭援助，如贊成民主、尊重人權、避免暴力等等。當前的立陶宛獨立事件就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者相信，今後如果中國大陸，或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再發生類似的事件，美國最可能的反應仍然只是在原則上重申它的價值觀（如民主、人權、道德、自決），而會避免在實質上給予任何具體的支持，以免給人干預他國內政的藉口。

對於中共的前景，美國報紙均持相對暗淡的看法，認為雖然由於文化、種族及歷史的原因，民主之花不可能在短期之內在中國大陸成長茁壯。但是經由這次學運的洗禮，中國大陸人民已告覺醒，中共目前只是暫時壓制了這次民主運動，中共將陷於長期的動盪不安。繼續改革和開放的政策是中共唯一的希望，但是殘酷的鎮壓行動削弱了中共成功的機會。中共實在是已陷入一個兩難的困境，因為持續而成功的經濟改革必須仰賴社會自發性的活力，以物質獎勵來刺激生產，採取市場導向的經濟，放鬆中央計畫對經濟的控制，但是這又會導致通貨膨脹、官員的貪污舞弊。而且就長遠而言，經濟的發展必將引起相當程度的政治和社會變化，中共如要持續對外開放的政策，吸收外資、鼓勵外國投資，保證經改不變，這些都將影響中共對

中國大陸的控制能力。中共若要維持其正統的馬列主義、絕對的共黨極權控制，它就無法繼續既定的改革開放政策。

簡單的說，中共陷於兩難的困境之中，在當前這種全世界都傾向於民主、改革的國際環境之下，中共拒絕，或延緩改革，將引發人民的不滿和抗拒，要求，逼迫中共改革、開放的壓力將持續不斷的增強，最後可能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經過了鄧小平十年來的經濟改革之後，中共在事實上也不可能再回到當年那種閉關自守的情況，中共似乎已經無法回頭，或逆轉整個局勢。但是持續的改革、開放，在短期內可能會造成社會的動盪，就長期而言又會削弱中共的權力，引起政治上的變化。就整體看來，中共的迴旋空間不大，可供選擇的方案並不多，中共只有逐步向前，努力克服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出現的流弊，調整本身的政治結構、意識形態，如此方有可能渡過難關。否則民主的種子已經栽下，雖然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通常是血腥、痛苦的，但是中國人民終將再起。

*

*

*